

▶▶▶ [上接 A3 版]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借鑒與超越

##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論述

■ 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課題組

對中國而言,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漲、資源環境約束加劇,資本投入邊際效率遞減狀況的出現,原有的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紅利正在衰減,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有鑒於此,我們強調要把經濟增長的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為中國經濟發展培育新的動力。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創新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科學論斷,並強調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必須把發展基点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從結構因素看,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优化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促進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和工業部門轉移,不僅為現代產業部門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而且促進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也為農業部門實現更

為集約的增長、推進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隨著經濟發展,如何克服二元結構制約,進一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成為促進中國經濟協調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2002 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此後,國家推出了一系列統籌城鄉社會發展、縮小城鄉二元結構的改革措施和 policy, 主要包括:改革糧食補貼制度,取消農業稅,建立

“三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擴大公共財政覆蓋面、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等。2006 年發布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借鑒與超越《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努力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促進農村整體面貌改善。同時,加快建立有利於農村的改革措施和體制機制,促進農業不斷增效,農村加快發展,農民

持續增收。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推動城鄉二元結構轉變,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是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平衡發展,最終實現國家整體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待續)

# 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建議書

■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長江學者 賈根良

(上接 4 月 23 日 A4 版)

第七,重視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和經濟思想史的教學。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教育體制中,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曾長期作為必修課在經濟學系(經濟學院)所講授。然而,修正的波拉尼經濟史研究,等等,這些多元化的經濟史研究傳統對於我國經濟史學科的發展的重要性遠比“量化史學”重要的多,但我國經濟史研究中能夠運用這些傳統的學者越來越少了,在“量化史學”的大潮中是否將完全消失也未曾可知。因此,我們在 2016 年 9 月召開的“第二屆北大經濟史學大會”的大會主題報告中,呼喚“經濟史學研究需要多元化的理論視野”。

第八,海外發文和建立獨立自主的本土學術規範問題。

本文在前述討論中對 2016 年我國高等學校第四輪學科評估中暫時被取消的(經濟學專業)《A 類期刊名錄》提出了批評,筆者現在繼續討論它反映出來的問題。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我國經濟學界掀起的“經濟學要與國際接軌”的大潮之下,海外發文就逐漸成為我國高等學校學科大評价和職稱晉升的基本標準。目前,我國絕大多數高校把《社會科學論文索引》和 A&HCI(藝術與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視作評價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最高標準。但在我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專業中,海外發文並不是被一視同仁對待的,而是設置了不同等級的外文期刊名錄(基本上只是英文期刊)。目前在我國內最有代表性且最具同性的大概是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目錄的期刊等級分級,它將經濟學的英文期刊劃分為四個等級:頂級(總共 5 種,所謂的 Top5)、第一類、第二類和第三類;第四輪學科評估的 12 種《A 類期刊名錄》的全部外文期刊的 12 種來自於其頂級(總共 5 種)和第一類(其中的 6 種)期刊,這反映出上海財經大學這個期刊目錄在我國高等學校學術評價中具有高度代表性。

那麼,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目錄存在什麼問題呢?查閱這些期刊目錄和它所發表的論文,人們不難發現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在其入選的 300 多種 SSCI 期刊中,沒有一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期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論文也不可能在其頂級、第一類和第二類期刊上發表,在第三類上發表的可能性也很小。第二,這個期刊目錄沒有考慮到學科特點之間的差別。例如,在所有期刊中,沒有一本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期刊入選,原因就在於這些入選的經濟史期刊已經被計量史學所支配。第四,在其頂級、第一類和第二類期刊,沒有一本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各流派的期刊入選,只是在最低級期刊級別即第三類期刊中,才選入了《劍橋經濟學雜誌》一種雜誌。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目錄,它沒有選入一本中國本土的經濟學期刊,其學術評價完全以國外期刊為準。我國其它高校經濟學專業的外文期刊分級與上海財經大學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具有其前四個特點。

實際上,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目錄的期刊等級分級完全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評價體系在中國的翻版。在西方發達國家,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期刊等級分級的目的非常明確,這就是在其大學中排擠和清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為了達到這種目的,它們還把經濟思想史學科等包括在其清除目標



中。這種期刊分級作為指揮棒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老制度主義經濟學、熊彼特主義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非新古典的發展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學科以及非數學形式主義從事經濟史和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者在西方發達國家高等學校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因為這些經濟學或學科幾乎完全不能在其權威(Top5)重要(上海財經大學分級第一類)和比較重要(第二類)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在學科評估中,這就必然對存在這些經濟學研究相關大學系科的學術評價非常低,在這種指揮棒之下,為了提高評估績效,這些大學在招聘、晉升、研究戰略等決策上不得不採取歧視這些經濟學的制度、政策和手段,甚至不惜驅逐西方主流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經濟學研究者,這是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西方發達國家長期占據支配地位的根本原因。

以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期刊等級分級目錄為代表的學術評價體系對我國高等學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生態環境已經造成了不良影響,在其影響下,我國許多重要科研机构所辦的經濟學專業期刊也日益“西方主流經濟學化”,對我國高等學校的職稱評定、學術發展和人才選拔和意識形態造成了許多嚴重的負面影響。這種狀況不改變,我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和我們的學術話語權難免不被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因此,這是筆者為什麼說,雖然我國高等學校第四輪學科評估迫於壓力,“仍沿用上一輪的評估方式,暫不增加‘A 類期刊’指標”,但在指導思想上仍重大程度上並沒有得到任何解決的重要原因。以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期刊等級分級目錄為代表的學術評價體系從根本上是與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思想背道而馳的,是與黨中央、教育部近年來不斷強調的學術價值取向——以中國方式、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研究中國問題,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主導思想背道而馳的。

此外,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期刊等級分級目錄為代表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僅助長了我國經濟學教育以(教學和建模)工具而非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式,而且也漠視中國問題意識,從而導致了脫離實際的不良學風。在我國的一些名牌大學,評教授已經不看國內期刊發表的論文,更不看研究結果在解決中國實際經濟問題中的作用,只看在國外所謂“頂級”和第一類等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数量。清華大學某文學院的一位 40 歲左右的副教授曾告訴筆者,他根本無暇關心現實問題,只是整天琢磨著如何迎合國外期刊的口味,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否則就別想晉升教授。早在 30 多年前,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就將這種現象稱作是“智力外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熱衷於與其經濟發展毫不相干的“高深”數學模型,盲目地推崇在國外主流經濟學發展上發表論文作為經濟學家的標志,而對發展中國家急需解決的技術創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貧困、失業、教育、農村發展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毫無興趣。這種學術評價受制於國外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嚴重背離了解決中國重大實際經濟問題的指導思想,助長了“依附型經濟學”和狹窄自重的惡劣學風,打擊了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早在 2006 年,筆者就已指出,在當前的我國已經出現了“依附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因此,如何在學術評價體系中突出中國問題意識,建立獨立自主的本土學術規範,這是目前我國經濟學教育中

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第九,人才隊伍建設和經濟學研究生入學考試問題。

我國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建設大量引進海歸肇始於 2005 年 6 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十年回顧”研討會,在該會上,復旦大學的一位著名教授提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應該減少國家輸送的優秀的博士生,而專注於為西方國家輸送優秀的博士生。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提議竟然得到了不少與會者的贊成,筆者在當時就對這種思潮提出了批評,針鋒相對地提出經濟學高級人才應該主要由國內來培養。正是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院掀起了一股高薪引進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名牌大學畢業博士以及在海外招聘經濟學院院長的熱潮,這一勢頭目前仍有增無減,相應地,在學科評估的教師隊伍建設這一項指標中,海歸所占比例也在不斷地加碼。

與自然科學領域不同,我國高等學校經濟學教師大規模招聘海歸的做法不利於我國經濟學的健康發展,存在著以下嚴重弊端。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壟斷了發達國家的名牌大學,它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僅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格格不入,而且其理論範式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其政策主張與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相沖突。其次,近十多年來,我國引進的“海歸”幾乎是清一色政治經濟學、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海歸”屈指可數,學習經濟思想史的幾乎沒有,這種大規模的引進海歸必將加強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教育中的支配地位。最後,2014 年在法國發生的經濟學教育改革事件說明,一旦西方主流經濟學徹底統治了中國經濟學界,不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等學科,而且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各流派和經濟學創新在中國都將陷入更嚴重的生存危機之中。

鑒於經濟學專業海歸主要是在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由西方主流經濟學存在嚴重缺陷的一元化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筆者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我國高等學校經濟學專業教師引進的海歸不應超過教師招聘總數的三分之一,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建設應該主要靠國內多元化經濟學教育體系培養。其次,大規模縮減經濟學專業領域中針對海外高層次人才的人才“千人計劃”項目,因為這些“千人計劃”的人才不僅基本上是由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元化教育體系的產物,而且許多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教育體系在國內不遺餘力的推行者,例如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對國內經濟學學術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影響的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職學術刊物期刊等級分級目錄就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最後,總結我國高等學校十幾年來實行的“國家經濟學人才培養基地”的經驗教訓,為我國高等學校經濟學專業教師隊伍提供人才儲備。由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才可以由海歸提供,所以,筆者建議,“國家經濟學人才培養基地”應集中培養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之外的經濟學理論人才。

與此相關的是改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入學考試科目和內容的問題。目前,在我國絕大多數高等學校財類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試中,主要的考試科目是數學和“西方經濟學”;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試中,“西方經濟學”所占考分比例超過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筆者早在 2005 年就指出,“2002 年教育部規定,早在經濟學碩士入學考試中所占考分數等於 4 年所學經濟學在考試中所占的分數,無疑將對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科目和內容過分注重數學和“西方經濟學”是模仿西方主流經濟學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教育體制的產物,應該進行改革。為了拋磚引玉,筆者在這裡針對經濟學碩士入學考試科目的改革問題,提出一個不成熟的建議:

經濟學碩士入學考試應該以較全面考察經濟學本科所學基礎課程,除了考外語和政治兩門課外,再考兩門專業基礎課,分別為專業基礎課 I 和專業基礎課 II,專業基礎課 I 包括數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外國近現代經濟史或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任選一門)三門課程,每門各占 50 分;專業基礎課 II 也包括三門,每門各占 50 分;西方政治經濟學(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或經濟學方法論任選一門,每門也各占 50 分。

第十,改革學科評估辦法和鼓勵各高校經濟學教育的多元化競爭。

2016 年 5 月,針對當時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的辦法,筆者提出了如下建議:經濟學專業應該恢復以前從二級學科對(重點)學科進行評估的做法,而不是一攬子地從理論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的一級學科層次上在總體上進行評估。這是因為,在這兩個一級學科中,不同的二級學科具有很不相同的特點。例如,從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來說,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世界經濟、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六個二級學科。這些不同的二級學科不僅“冷熱”度不同,而且從學術上來說,本來就不存在相同的評價標準。因此,不應該對這些不同的二級學科採用完全一樣的評估標準。

在筆者看來,在過去十年中,在一級學科層次上籠罩地進行學科評估,已經造成了學科發展之間的嚴重失衡。以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為例,由於不直接評估二級學科,在許多經濟學院一窩蜂地大力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情況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枝獨大導致了與“西方經濟學”具有同等地位的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這兩個學科的嚴重衰敗,造成了政治經濟學學科受到嚴重擠壓,至於像中山大學、山東大學等許多高校的政治經濟學學科實際上已經垮掉,即使在國內號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頭頭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實際上真正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目前只不過幾個人而已。出於這些考慮,筆者建議恢復從二級學科對重點學科進行評估的做法,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避免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枝獨大導致理論經濟學其他學科的衰落。第二,有利於避免我國大學經濟學學科同質化嚴重的現象,鼓勵各大學特別是北京、上海、廣州和天津等之外的各大學發展自己獨特的學科競爭優勢,有利於優秀人才在國內各大學特別是中西大學之間較為均衡的分布。

至此,筆者針對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中存在的弊端,比較全面地提出了十點具體的改革建議。在過去幾年中,筆者曾將這些改革建議的大部分內容多次報送過《成果要報》或內參,但沒有一次被採納。筆者的博文《第四輪經濟學專業學科評估指導思想的根本性錯誤》發表後,某著名報紙的記者曾於 2016 年 5 月就中國經濟學學術評價中存在的問題對筆者進行了訪談,但《經濟學專業學術評價:警惕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支配》——專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賈根良》最終被該報拒絕發表。這些情況說明,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改革的阻力仍是很大的,因此,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仍可能只是一個備忘錄,以供有志者在改革時機成熟時參考和借鑒。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改革是筆者長期倡導的中國經濟學自主創新的內在要求,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的內在要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對於本文提出的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的建議,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約 400 年前在《偉大的復興》一書的序言中針對他描述的对象所指出的那樣,筆者同樣“希望人們不要把它看做一種意見,而要看作是一項事業,並相信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不是為某一宗派或理論奠定基礎,而是為人类的福祉和尊嚴……”(完)

(原載《政治經濟學報》第 1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5 月)